

对宏观经济膨胀的分析

一、宏观经济膨胀的表现

宏观经济膨胀指的是宏观经济需求超出国民经济实际生产能力的一种经济现象，它是导致经济增长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近年来，宏观经济膨胀，首先反映在价格水平的变动率上。我们现在分别考察消费品市场和投资品市场的价格水平变动率。统计资料表明，自1984年以后，我国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升，每年以7—8个百分点递增。进入1988年，更以两位数的增长为国人所震惊。此外，集市贸易的消费品价格和职工生活费用指数都远远高于同期零售物价指数。如果考虑到在物价上涨的同时还存在许多限价商品，以及市场上大量商品的缺货和脱销，那么，消费品供与求之间的实际差距远比零售物价指数所表现的要远为严重。在投资品市场上，投资品价格上涨更为猛烈。虽然从统计年鉴上我们得不到直接的资料，但可进行间接的估算。有关人士曾估算，我国自1981年以后，积累额的平减指数不仅高于国民收入平减指数，而且高于消费额和零售物价平减指数。^①这清楚地说明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速度超过了消费品价格。上述情况表明，近年来的宏观经济膨胀具有“双膨胀”的特点，而且这种膨胀过程可回溯到1984年，尽管中间虽曾采取过几次“紧缩”政策，但都因决心不大，为时不久又让位于新的剧烈扩张。所以，要治理好这种历年膨胀积累起来的“过热”症状，必须要有坚定的决心和较为长久得当的措施。

二、宏观经济膨胀的效应

宏观经济膨胀意味着总需求膨胀拉动国民经济生产超越了潜在总供给的容许界限。所谓潜在总供给，一般指一国生产能力在正常的体制和技术条件下的合理发挥所能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当国民经济运行越过潜在总供给的界限，会引致一系列恶果。

从短时期的角度看，假如国民经济的资源及其他条件允许其实际生产超过潜在生产能力，那也不过是寅吃卯粮而已，是预先支付了未来的潜在国民经济生产能力。据估计，近些年的宏观经济膨胀使我国的外汇储备减少1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80亿元，正常库存减少约220亿元，黄金储备减少约110亿元，加上国有固定资产未能及时补偿的损耗，资源滥用、新增外债与内债等，合计约7000—8000亿元，这些无疑使今后的经济增长蒙上了一层阴影。^②

宏观经济膨胀还会导致经济结构恶化。我们知道，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软预算约束的经济，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流动的调节和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相当无力。当宏观经济膨胀时，各个产业部门会一齐扩张，努力争取在扩张势头中不落后，这种扩张势头只有在遇到坚硬的资源约束时才会停下来。可是资源约束却是非均匀性的，各产业部门有“长线”与“短线”之分，在猛烈的经济扩张浪潮中，会出现日渐严重的“瓶颈”现象，“长线”部门的突飞猛进使“短线”部门更显滞后。由于国民经济的一些实际有效产出由短线部门制约，长线部门猛烈扩张的结果会形成相当一部分无效供给，这就是说，需求膨胀导致经济结构更为恶化，造成实际产出小于潜在总供给。

从中长期的动态平衡角度看，宏观经济膨胀还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潜力造成损害。要知道国民经济短期平衡的基础是潜在供给水平，国民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的基础则是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因此，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政府应注重于培育潜在总供给的增长。国民收入潜在增长率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frac{\Delta Y}{N} = \frac{\Delta N}{N} + \frac{\Delta Z}{Z}$$

这里，Y为国民收入，N为劳动力，Z为劳动生产率，公式意味着国民收入的潜在增长率由劳动力的增加潜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潜力决定。就劳动力投入而言，它的增加取决于投资率和资本产出率。这两个因素，对政府来说，能直接操纵的变量是投资率，然而，投资率不可能任意提高，它必须同国民收入的储蓄率相等，否则便会发生投资膨胀。投资膨胀发生会使资本产出率趋于降低，结果仍使劳动力投入难以增加。如不顾经济效益强行增加工人，只能降低劳动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的劳动力增加不会对经济增长有什么积极作用。就劳动生产率而言，它由技术进步和人均资本增加，这两个因素决定，而其中技术进步是最重要的因素。宏观经济膨胀会迫使政府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日常“救火式”的工作上，把人力、物力、财力专注于“瓶颈”部门的弥补和巨额的物价补贴上，而对教学、研究与开发这些对长期生产率有着极为重要影响的部门，却被忽视了。政府也难以有很多精力去组织国民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的实施。

宏观经济膨胀另一大害处是会扰乱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首先，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利益关系再调整的社会进程，要使改革比较顺当，需要一个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然而，宏观经济膨胀却使各种经济利益关系紧张起来，各种争夺资源的活动大为加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制改革很难起动，假如要强行过关，便有可能引发社会较大的动荡，甚至有可能进一步退两步。其次，宏观经济过热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对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一种严重威胁，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政府有关部门往往采取加强对经济、尤其是对物价全面管制的措施，而公众从当前形势出发，一般对此抱支持或欢迎态度。这样，就有可能不知不觉又滑回到旧体制的轨道。第三，通货膨胀对改革所要求的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带来了消极影响，它迫使各社会集团都作出努力，使其自身利益少受或不受损害。然而，靠政府开支支付薪金的干部与知识分子，他们在通货膨胀中的地位最为虚弱，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生活水准下降，而这部分人本应是改革可靠的社会基础。在通货膨胀的打击下，许多人有可能对现行政策怀疑、动摇以致反感，一些人则会投身到经商洪流中，少数不坚定分子甚至会利用手中权力来增强自己的经济地位，从而造成腐败现象更快更大的蔓延。所以，宏观经济膨胀最终会削弱改革的社会基础。

三、几点建议

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保持稳定的持续经济增长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宏观经济膨胀会严重干扰这一目标的实现。但究竟如何治理？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一种比较普遍的主张是应一手控制需求膨胀，另一手增加有效供给。从理论上讲，这种主张一般还是对的，但严格地讲，上述说法过于含糊。因为它没有把中长期经济政策与短期经济政策的目标区分开，也没有区分经济操作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范围，从而就难以列出一张实现其主张的有轻重缓急的施工方案。

首先应明确短期经济稳定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一国在短期内的实际产量因种种原因

是波动的，这种波动如过于剧烈则应该加以控制。所谓控制需求，便是指当需求膨胀导致经济运行超过其潜在生产能力时应抑制其需求，当经济低于其潜在生产能力时则应增加需求。当前对中国而言，无疑应是抑制需求。一国潜在生产能力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它一般是稳定的，保持长期增长必须提高或保持潜在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然而，如前所述，如果短期内因需求膨胀造成产量急剧波动，那对潜在总供给的增长颇为不利。因此，应该把短期需求管理与中长期的供给管理相结合。短期管理应注重加强需求管理，当前应注意：对超过潜在总供给的需求膨胀，应果断予以抑制，同时这种抑制应尽可能艺术些，尽量对后续生产不造成消极影响。这要求做到：第一，这种抑制不应过快过猛，不能要求在很短的时期内将宏观经济膨胀的势头一下子刹住，假如硬要勉为其难，很有可能使经济由过热跃到过冷状态，遇到较大的损失。第二，实行宏观经济政策要考虑到政策执行的滞后性，即不要等经济运行已达到其顶峰，才实施使其下降的政策，因那样有可能加剧其波动的幅度，较好的选择是“淡化”经济波动周期的逆向调节。第三，需求管理也应带有结构化倾向，即对那些非生产性的投资，如楼堂馆所等基本建设，以及长线部门的重复投资应作为抑制需求的重点，这种结构性的需求管理虽不能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问题，但对缓和供求之间的矛盾仍有所裨益。

在宏观经济进入正常轨道之后，政府应把注意力放在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实施上。政府应注意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培养，对教育、研究与开发提高企业活力等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精心加以扶植，这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工作。但有必要再重复一句，如果没有健全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的实施，国民经济就难以进入健康发展的中长期轨道，任何好的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也会被逼难产。

我们知道，宏观经济膨胀既有体制上的深层原因，也有宏观经济政策的直接诱因，治理应是多层次的。现行经济体制存在严重不合理因素，制约了国民经济潜力的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想使经济效益更上一层楼，必须推行进一步的改革。同时，控制“过热”的宏观经济操作也只有与经济改革相联系，才有大的积极意义。否则，就会成为经济冷热交替中的变奏曲。这要求做到：第一，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注意不要为后续改革造成障碍。如当前对需求膨胀实施某种行政手段，就要注意不能因此将已出台的改革中的合理因素也除去，更不要为后续改革造成大的困难。第二，宏观经济形势好转以后要及时进行较大步子的改革，逐步使经济体制更适合于商品经济的要求。第三，一些较小的改革应配合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及时出台。例如，可设想对前一时期实施的地方财政包干、企业承包，作某些调整，以减少地方与企业对需求管理的反控制因素。最后，在宏观经济膨胀中社会集团消费、行政管理费用开支剧增也是一个重要源头，而这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无关系，而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种种困难，最终又都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相关。总之，政治体制改革无可避免。

注：

①杨仲伟等：《我国通货膨胀的诊断》，载《经济研究》1988年第4期。

②参见《经济学周报》1989年3月26日。